

CHAPTER 3

为什么
犯过严重
错误还能
得到人民
支持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内容十分丰富。既有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伟大成就的经验，也有犯过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严重损失的教训。犯过严重错误的教训，主要是指1957年以后至19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期，也就是邓小平所说的，搞了20年“左”，“整整二十年里，农民和工人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¹¹但中国共产党并未因犯错误而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一则“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中国人总是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对待犯错误的个人和组织，他们更关注分析犯错原因和犯错后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和行为，不因犯错而一概抹杀成绩、否定历史，所以世界上许多有识之士赞誉中国拥有世界上少有的好老百姓；二则“过而能改，善莫大焉。”中国共产党真正与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担当意识和做法，勇于正视错误、修正错误的负责态度和言行，赢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理解与支持。

动机与效果的严重背离

从1949年到1956年，新中国仅用七年的时间就基本完成了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1957年年底第一个五年计划（1953~1957）建设的各项指标也大都大幅度地超额完成。这是一个凯歌高唱的时期，中国人民改变国家贫穷落



“大跃进”期间，北京市民将自己家中的铁制品拿去炼钢。

后面貌的决心和斗志被极大地激发起来。正如毛泽东指出的那样，“从来也没有看见人民群众像现在这样精神振奋，斗志昂扬，意气风发”。¹²“七八年来，都看出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成为一个大国，一个强国”，“我看，我们这个民族现在好比打破原子核释放出热能来”。¹³

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对经济发展规律和中国经济基本情况认识不足，更由于毛泽东、中央和地方不少领导者在胜利面前滋长了骄傲自满情绪，并由此过分夸大个人主观意志作用，结果没有经过认真的调查研究和试点，就于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一搞就是三年。

在“大跃进”中，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盛行。在农业方面，鼓吹“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粮食亩产量层层拔高。农业部根据各省、市、自治区汇报的产量进行汇总统计，1958年，全国粮食产量达到8000

亿斤(实际只有4000亿斤)。在工业方面,片面追求钢产量的高指标,提出“超英赶美”口号,为此掀起了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全国几千万人上阵。并且,“以钢为纲”带动了其他行业的“大跃进”。“大跃进”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工农业比例严重失调,国民经济出现严重困难。1960年同1957年相比,城乡居民平均的粮食消费量减少了19.4%,其中农村人均消费量减少23.7%,植物油人均消费量减少23%。许多地区因食物营养不足而相当普遍地发生浮肿病,不少省份农村人口死亡增加。据估算,“大跃进”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高达1200亿元。¹⁴

对于这段历史,邓小平指出,政治上的“左”导致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1959、1960、1961年三年



小孩坐在水稻上以标榜田里生长的水稻的密集丰盈的程度,成为“大跃进”运动中出现的“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的典型代表。

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了。

1962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¹⁵

正如邓小平所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大灾难”,它的恶果已为实践所证明:在政治上混淆敌我,制造大量冤假错案;在经济上大批“唯生产力论”,“仅是国民收入就损失了五千亿元”;¹⁶在

3. 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文化上百花凋零，教育、科技遭受重创。十年浩劫拉大了中国经济、科学、文化、教育同世界发达国家的差距。

“大跃进”的失误和“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给党、国家和民族带来巨大损失，教训是深刻的。研究和反思“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的发生，人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得出不同的观点和结论，但从中国共产党独立探索寻找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视角来分析，两者有共同点，就是都反映出主观认识与客观实际、动机与效果的严重背离。

毛泽东发动“大跃进”的目的，就是为了尽快改变国家的落后面貌，使中国能够尽快成为一个大国、强国，赶超发达国家，这一动机和目的无可厚非。因在庐山会议上赞同彭德怀的观点而被打成“反党集团”成员、含冤达20年的黄克诚在复出后曾指出：“毛主席晚年的雄心壮志仍然非常之大，想在自己这一生中把本来要几百年才能办到的事情，在几年、几十年之内办到，结果就出了一些乱子。尽管这些乱子给我们党和人民带来了不幸和创伤，但从他的本意来看他还是想把人民的事情办好，把革命事业推向前进。他为了这个理想操劳了一辈子。”罗德里克·麦克法夸尔在《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第二卷）大跃进1958-1960》一书中也指出：“大跃进”有一个积极的方面。在任何发展中国家，有一点非常关键，那就是那里的人民应该认识到他们不必逆来顺受、无所作为地处于自然的枷锁之下。毛坚持不懈地宣传这一思想。毛就像一个大声疾呼地振奋起一班新兵的士气、将他们引入新世界的军士长，将中国人民激励起来。毛的同事似乎被毛的想象力所左右。他们曾为再造中国进行了一场革命。在长征中将他们引向胜利的人，现在告诉他们经过一小段冲刺就可以到达乌托邦，这并不是地平线以外虚无缥缈的马克思主义极乐世界，而是就在眼前，在中国的田野上和工厂里，建立一个社会纯洁、经济强大、在国际上受到尊重的新国家。¹⁷问题在于：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与方式出了问题，“大跃进”效果大打折扣。

同样，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观愿望是建设一个理想的社会

历史的
轨迹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大跃进”中全民大炼钢铁。

主义新社会。正如《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指出的那样：毛在革命胜利后仍孜孜不倦追求革命的纯洁性，这是他发动“文化大革命”的动机；毛对革命纯洁性的追求导致他夸大和错误估计了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所面临的问题。¹⁸ 在毛看来，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进攻，而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复辟。毛相信，斯大林死后苏联的经验证明，如果修正主义分子在执政的共产党内取得了权力，资本主义复辟就会出现。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有必要经常与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党内当权派”作斗争。实际上，在工业国有化和农业集体化之后，这将是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主要形式。这种进行阶级斗争的方式在一场文化革命中将“大胆地唤起基层的广大群众”，不仅批判党内当权的修正主义分子，而且批判存在于他们自己思想上的自私和自由化的倾向。因为修正主义的根源在于

3. 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人类的自私自利，所以必须要有一场持续数十年的文化革命才能保住社会主义社会的纯洁。¹⁹

保持革命的纯洁、建立理想的社会主义，这样的动机是无可挑剔的，问题在于，目标过于脱离实际且达到这一目标的方式和手段出了问题。1967年毛泽东本人在谈到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强调那是因为过去农村的斗争、工厂的斗争、文化界的斗争、社会主义教育运动，“都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要实行“文化大革命”，“以阶级斗争为纲”，以“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这样的思维方式和以此制定的方针路线，只能造成党内外严重的思想和行动上的混乱，造成社会严重的破坏和倒退。

历史的
轨迹

中国
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犯错误期间 也有重要成就

尽管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发生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的错误，但如果对这段历史作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应该承认，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事业仍然取得了举世公认的重要成就。

“大跃进”给工农业生产和建设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和浪费。然而，工业建设、科学研究和国防尖端技术的发展以及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机械化、现代化发展的许多工作，都是在那些年代开始布局的。根据权威的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提供的材料，从新中国建立到1964年，重工业各主要部门累计新建的大中型项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



中国的“两弹之父”邓稼先。



中国第一颗氢弹在西部某地爆炸成功。

三年“大跃进”期间开工的。这三年新增的炼钢能力占从1949年到1979年新增炼钢能力的36.2%，采煤能力占29.6%，棉纺锭占25.9%。经过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些开工项目和新增能力获得了扎实的成果。

其中，特别突出的是石油工业的发展和国防尖端科学技术的研发。中国以前被认为是个缺油国，所用燃油是从国外进口的“洋油”。1959年，技术人员在东北的大庆找到工业性油流。1960年，在国民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中共中央决定从各方面抽调工人、干部和技术人员，集中力量在茫茫荒



在大庆会战初期，“铁人”王进喜为了保住钻机，不顾左腿重伤跳进泥浆池，用身体搅拌泥浆，奋战3个多小时制伏井喷。

原上进行勘探开发，仅用一年时间就探明油田面积并进行试采实验，三年就建设起中国最大的石油基地，产量达全国石油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到1965年，中国需要的石油已经全部自给，中国人靠进口“洋油”过日子的时代宣告结束。

3. 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国防尖端科学技术方面的工作在1958年也开始迈出步伐。1961年，中共中央作出以研制“两弹”（原子弹和导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1964年10月16日，中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当天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不是由于中国相信核武器的万能，要使用核武器。恰恰相反，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更难能可贵的是，面对严重的经济困难，中国人民表现出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战胜困难的英雄气概和高昂的精神状态，在各行各业涌现出了大批模范先进人物。他们中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县委书记，有不怕困难、艰苦奋斗被称为“铁人”的石油工人，有自力更生、艰苦创业的农民党员和群众，有公而忘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解放军战士。这些楷模的出现，激发起广大群众投身建设的巨大热情。对此，作为亲历见证者的邓小平一直念念不忘。1979年11月，他在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吉布尼和加拿大麦吉尔大学东亚研究所主任林达光等人时指出：“你们如果是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初来，可以看到中国的社会风尚是非常好的。在艰难的时候，人们都很守纪律，照顾大局，把个人利益放在集体利益当中，放在国家利益、社会利益当中，自觉地同国家一道来渡过困难。1959年开始的三年困难时期就是这样渡过的。”²⁰

所以，1981年6月中国共产党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谈到包括“大跃进”在内的十年建设（1956~1966）成就时指出：“我们现在赖以进行现代化建设的物质技术基础，很大一部分是这个期间建设起来的；全国经济文化建设等方面的骨干力量和他们的工作经验，大部分也是在这个期间培养和积累起来的。这是这个期间党的工作的主导方面。”

历史的
轨迹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写到“文化大革命”十年的时候，除用大量篇幅讲“文革”运动和毛泽东晚年错误外，也讲道：“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仍然取得了进展”；“执行正确的对外政策”，“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局面”。这一判断也是合乎实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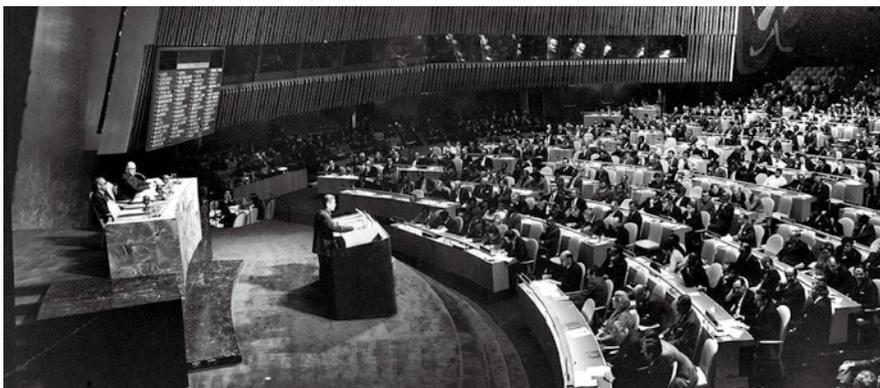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损失，但在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仍然取得了进展：粮食生产保持了比较稳定的增长，1976年达到5726亿斤，比1965年增加了1835亿斤；工业交通、基本建设和科学技术方面取得了一批重要成就。1976年的原油产量相当于1965年的6.7倍；一些工程艰巨的新铁路和南京长江大桥建成通车；一些技术先进的大型企业投产；核技术、人造卫星、运载火箭等尖端科学技术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也指出，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下级经济管理官员维持了经济体制的运转，这也解释了为什么1971年林彪之死对经济工作影响甚微。在1972年和1973年中，绝大多数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有



1970年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当卫星通过北京上空时，人们激动地争相眺望。

所增长，基本建设的投资也保持在高于1966~1969年的平均水平之上。即使在1972年严重的旱灾造成粮食减产的情况下，农业收成也稍有增长。在1974年和1976年，一些重要的工业产品产量有所下降，但是能源及其他多种产品的产量，即使在政治动乱的年代中，仍有所增长。因此，即使像1976年——那一年，周恩来和毛泽东先后逝世，还发生了唐山大地震——那样一整年处于混乱状况，也不会对经济工作产生持续的影响，其影响的程度与1967~1968年的情况相当，比“大跃

3. 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1971年11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的全体会议。图为乔冠华团长在会上发表讲话。

进”的影响程度还要低。²¹

更引人注目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周恩来审时度势，适应形势变化的需要，使中国的外交工作实现了新的转变。1971年10月25日，第26届联合国大会通过决议，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2年2月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与毛泽东会见，并同周恩来会谈。中美双方经过会谈，于2月28日在上海签订的《中美联合公报》，标志着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的开始。中美关系的缓和直接推动了中日关系的改善，中国同西欧许多国家也出现了一个建交高潮。与外部世界的交流逐步增加，为中国70年



经过20余年的外交斗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首次坐在联合国大会中国代表席上。图为1971年中国代表团团长乔冠华（前左）、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前右）开怀大笑。

历史的
轨迹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代末期开始的改革创造了外部条件。

回首20年曲折发展的历史，曾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著名史学家胡绳1984年时曾指出：“如果说35年来一无是处，全部是错误的积累，那就不能正确解释35年的历史。当然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一个大转折，但这一转折之所以能够形成，也还是有过去生产发展的底子。所以建国以来的历史决不是错误的积累。”长期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也指出：“20年‘左’倾错误期间，国家的经济总的说还是发展的。我们根本否定‘文化大革命’，但那十年间也有不属于‘文化大革命’的成就，科技方面的成就，外交方面的成就。”

这些成就正是使得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经受失误和挫折后仍然可以重新凝聚民心、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重要的物质基础。

领袖与群众 同甘共苦

获得人民群众支持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毛泽东拥有崇高的威望，而毛泽东等领导人反对特殊化，与群众同甘共苦的做法，更加重了他们在人民心中的分量。

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中共中央没有隐瞒灾情，而是及时地把困难情况告诉人民，共克时艰，只用了三四年的时间，就克服了国民经济衰退的巨大困难。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所形成的威望，这是不可想象的。

3. 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比如当时因经济困难，为减轻国家的经济供应负担，要精简那些在“大跃进”中从农村招工到城市里的工人和他们的亲属，从1961年年初到1963年6月，全国共精简职工约2000万、城镇人口2600万。广大职工、干部顾全大局，体谅国家困难，表现出了很高的觉悟，使这一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作为国务院总理的周恩来曾深有感触地说：下去这么多人，等于一个中等国家搬家。在中国，没有哪个政权能够这样做，只有我们才有这样做的群众基础。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中央党、政、军副部长以上干部会上也指出：“回想1958年、1959年我们犯了那么‘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遇到很大困难，……还下放了两千万职工，关了一些企业。那个时候为什么能这样做？那一次调整国民经济进行得比较顺利，是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党和群众的关系密切，党的威信比较高，把困难摆到人民面前，对群众讲清道理，做了大量的工作。单单两千万人下放这一件事情，就不容易呀。如果党和政府没有很高的威信是办不到的。”²² 1985年8月，邓小平在同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谈话时又一次指出：1959年到1961年三年困难时期，“那时，我们党和毛泽东主席由于长期斗争历史形成的威望很高，我们把

历史的
轨迹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1952年12月，毛泽东在北京中南海接见延安的全国劳动模范杨步浩。

困难的情况如实告诉了人民，‘大跃进’的口号不再喊了，并且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政策、步骤和方法，1962年就开始从困难的境况中恢复，1963年、1964年情况比较好”²³。

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人民群众的生活十分困难。毛泽东等中央领导人感同身受，带头勒紧裤带过苦日子、渡难关。1960年11月9日，中共中央专门就高级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特需供应问题发出指示：“有关特需供应的规定，范围宜定得小些，标准宜定得低些”，“实行副食品特需供应的照顾面，对党外民主人士和高级知识分子可以稍宽，对党内干部必须从严。不宜不分党内外，笼统地规定某一级以上的干部一律享受特需供应”。

“坚持这一条，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了便于团结、教育和改造党外人士，在生活上多照顾他们一点，群众是不会有少意见的。但是，对党内的照顾面如果规定得过宽，或者虽有比较适当的规定，而控制不严，听任某些干部在规定之外利用职权或‘走后门’来取得额外供应，不作严肃的处理，其后果就很严重。干部生活特殊，脱离群众，从眼前来说，会损害党群关系，妨碍我们带领群众来战胜困难，渡过灾荒；从长远影响上看，则势必对干部的思想发生腐蚀作用，发展下去，就有出现‘特殊化’的危险。”这一规定在执行中，第一类的副委员长、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政协副主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和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供应标准是：每户每天肉一斤，每月鸡蛋六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第二类的人大、政协在京的常委，国务院各部委的正、副部长，正、副主任，高法副院长、高检副检察长，人大、政协的副秘书长，各民主党派中央的主席、副主席，在京的高级知识分子中的一级人员，供应标准是：每人每月肉四斤，白糖二斤，甲级烟两条，鸡蛋三斤。对于鸡蛋一项均看货源情况，少的时候少供应，没有的时候不供应。

为作表率，毛泽东本人中断了爱吃的红烧肉。在三年困难时期，毛泽东过了三个生日。从保存下来的菜谱看，这三个生日都过得相当简单，没有酒，

3. 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没有寿糕，也看不出丝毫喜庆的氛围。1962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69岁生日，他只吃了早餐，晚上仅喝了一碗麦片粥。早餐时，毛泽东请了身边工作人员一起吃，菜谱上记载着这样几道菜：“干烧冬笋、油爆虾、白汁鲤鱼、鸡油冬瓜球、炒生菜。”

同时，毛泽东自降工资，将工资由一级每月600元降为三级每月404.80元，一直到1976年他去世也没有改变。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带动下，1960年9月11日，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向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提交了《关于当前劳动力安排和职工工资问题的报告》，报告提出：“根据最近中央书记处会议的指示，为了进一步地缩小高、低工资之间的差距，以利更加密切领导与群众的关系，我们对降低国家机关十七级以上党员负责干部的现行工资标准提出如下建议：三级（包括原来的一、二级）降低百分之十二；四级降低百分之十；五级降低百分之八；六级降低百分之六；七级降低百分之四；八级降低百分之二；九级至十七级各降低百分之一。企业、事业单位中相当于国家机关十七级以上的党员干部的工资，应该同样降低。军队中的党员负责干部的工资，也应该相应地降低。”而“非党干部的工资标准，一律不予降低”，“降低十七级以上党员干部的工资的措施，从今年十月份起执行”。9月26日，中共中央转发国家计委党组、劳动部党组的指示，认为这个报告所提出的各项措施是正确的，望即布置执行，并提出“党员领导干部的工资，今后几年内应当逐步降低，以缩小高低工资的差距，并利于带动群众艰苦奋斗，勤俭建国”。

1979年11月，邓小平专门就此事指出：“‘文化大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提出过，怎样使高级干部同下面干部和人民群众生活比较接近一点，我们曾经把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降低了三次，并且明确规定高级干部的工资标准不再增加，以后只能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提高广大干部和职工的工资，改善群众的生活。”²⁴

中国社会在几千年的发展中，形成了小自家庭、大至国家的集体主义式的同甘共苦的情感模式。家庭有困，夫妻亲族共同化解；国家有难，仁人志

历史的
轨迹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士毁家纾难。中国古代典籍《战国策·燕策》上有“燕王吊死问生，与百姓同其甘苦”之语，讲述的是发生在燕国的一个故事：燕国太子继位后，无论谁家婚丧嫁娶等事，他都亲自过问，与百姓同事安乐和悲苦，最终把燕国治理得国富民强，受到举国上下的一致拥戴。

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与群众同甘共苦、风雨同舟的担当意识和做法，正是取信于民、获得群众支持的重要举措。

正确对待 所犯错误

对于在探索过程中出现的严重失误，中国共产党并不讳言，而是公开郑重地承认并反思错误、改正错误，以为借鉴，体现出成熟大党应有的风范。

对于“大跃进”造成的工作失误，毛泽东主动承担了责任。在1962年初召开的由中央和中央各部门，各中央局，各省、市、地、县的主要负责人以及一些重要厂矿和部队的负责干部参加的共约7000人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²⁵

“七千人大会”后，刘少奇召开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把“七千人大会”的精神向党外民主人士通了气，说明几年来国内工作的缺点错误，责任在中

3. 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国共产党，主要责任在党中央。周恩来就政府工作中的问题代表国务院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出席会议的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为中国共产党襟怀坦白、敢于承认错误和认真纠正错误的郑重态度所感召，纷纷表示愿与共产党同舟共济、团结一致、克服困难。

对“大跃进”的教训，毛泽东是刻骨铭心的，痛定思痛，他告诫说：“这些教训都要牢牢记住，要经常向人们讲，永远不要忘记。”1965年，随着国民经济的根本好转，一些领导人头脑开始有些发热，又想大干快上。毛泽东这时比较冷静，他提醒说：“鉴于过去的经验，欲速则不达，还不如少一点慢一点能达到。”“我看大家想多搞，你们也想多搞，向老百姓征税征粮，多了会闹翻，不行的。这是个原则问题。要根据客观可能办事，绝不能超过客观可能，按客观可能还要留有余地。留有余地要大，不要太小。要留有余地在老百姓那里，对老百姓不能搞得太紧。总而言之，第一是老百姓，不能丧失民心，……脱离老百姓毫无出路，搞那么多就会脱离老百姓。”

对于如何看待“大跃进”的错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有过两次讲话。1980年2月，邓小平指出：“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1958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²⁶ 1980年4月，邓小平在同中央负责同志谈话时又说：“‘大跃进’，毛泽东同志头脑发热，我们不发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和我都没有反对，陈云同志没有说话。在这些问题上要公正，不要造成一种印象，别的人都正确，只有一个人犯错误。这不符合事实。中央犯错误，不是一个人负责，是集体负责。”²⁷

中央领导人这种主动承认错误、承担责任、引以为戒的做法，并没有使他们的形象受到损害，反而得到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拥护。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中央进行了拨乱反正工作。《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特别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严重错误作

历史的
轨迹

中国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了彻底否定，同时明确指出对“文化大革命”的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

失败是成功之母，中国人总是善于把错误作为正确行动的先导。

在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同时，邓小平还称“文化大革命”也有一“功”：“它提供了反面教训。没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不能制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思想、政治、组织路线和一系列政策。……‘文化大革命’变成了我们的财富。”²⁸

在承认毛泽东有错误的同时，中共中央也正确评价了毛泽东的功绩，对当时出现的全面肯定或全面否定毛泽东的两种不正确的思潮加以拨乱反正。前面已提到的含冤达20年的黄克诚，在复出后就有针对性地指出：

“有些同志对毛主席说了许多极端的话，有的人甚至把他说得一无是处。我认为这是不对的，这样做不但根本违反事实，而且对我们的党和人民都非常不利。有些同志，特别是那些受打击、迫害的同志有些愤激情绪是可以理解的。大家知道：在毛主席晚年，我也吃了些苦头。但我觉得，对于这样关系重大的问题，决不能感情用事，意气用事。我们只能从整个党和国家的根本利益、从十亿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从怎样做才有利于我们的子孙后代、有利于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出发来考虑问题。多少年来，举世公认毛主席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领袖，是中国革命的象征，这是合乎实际的。”这篇讲话对正确认识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产生了重要影响。1980年8月21日、23日，邓小平两次会见意大利记者法拉奇，回答她的提问。在谈到对毛泽东的评价时，邓小平指出：毛主席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他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²⁹ 在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指出：“从许多方面来说，现在我们还是把毛泽东同志已经提出、但是没有做的事情做起来，把

3. 为什么犯过严重错误还能得到人民支持？



1980年8月，邓小平接受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左一）采访。在这次棋逢对手的采访中，法拉奇接连抛出了一系列在当时看来颇为尖锐敏感的话题，睿智的邓小平则借此机会明确阐述了中国在一系列问题上的立场和态度，让西方世界对中国领导人有了全新的认识。

他反对错了的改正过来，把他没有做好的事情做好。今后相当长的时期，还是做这件事。当然，我们也有发展，而且还要继续发展。”³⁰

勇于正视错误、修正错误之后，继续发展才会有正确的方向。

1989年3月24日，曾任毛泽东秘书、担任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胡乔木由美籍物理学家李政道教授牵线以客座教授的身份访美。在加州理工学院，面对着100多位教授、研究生，胡乔木作了一次题为《中国为什么犯20年“左”倾错误》的学术演讲。他之所以讲这个题目，是经过仔细考虑的。一方面，它显示了中国不仅在实践上走出了“左”倾阴影，排除了“左”倾错误的干扰；另一方面，它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具备足够的理论勇气认识自己的错误和不足，同时也具备了足够的理论智慧来探索新的发展之路。

不断追求真理，随时纠正错误，就能得到群众支持而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在他的名篇《为人民服务》一文中指出：“因为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我们如果有缺点，就不怕别人批评指出。……只要我们为人民的利益坚持好的，为人民的利益改正错的，我们这支队伍就一定会兴旺起

历史的
轨迹

中国
共产党
为什么
能？

增订本

来。”³¹ 1962年他依然强调：“有了错误，……我看不应当怕。我们的态度是：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³² 1965年邓小平也指出：“没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精神，就不会及时地总结经验，修正错误；也不会用正确的和错误的经验，正面的和反面的经验，来教育干部、党员和群众。毛泽东同志经常教导我们，不犯错误的党，不犯错误的人，不犯错误的领导是没有的，问题在于及时总结经验，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精神检查工作。”³³

毛泽东、邓小平所言，典型地反映出并完全契合中国人对待错误的认识传统和思维习惯。中国人向来认为：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即使是纯金，难免有瑕疵；即使是圣贤，也难免犯错误。集中反映孔夫子思想的《论语》中有“子张篇”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君子也会犯人所共睹的错误，重要的是君子能够改正错误，这是君子能受到尊敬的原因所在。中国共产党对所犯错误不讳言并修正错误的做法，符合中国人对“君子之过”的评价标准，因此，中国共产党仍旧获得群众的支持就不难理解了。

“坚持真理，随时修正错误”，在未来的改革、发展过程中，仍将是中国共产党取信于民、获得群众支持而需要恪守的工作态度、方法和信条。

